

莫斯科藏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时期历史档案概况

荆宇航*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及发展的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其身影出现在中共革命前期的几乎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正因如此,当今的俄罗斯保留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档案文献,对于研究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前,中国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关注过这些俄罗斯档案馆收藏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档案,并对之进行过一定的梳理和介绍。^①但是,限于不同时期俄罗斯各家档案馆对所藏档案开放程度的不同,以及学者个人研究兴趣、查阅时间及经费的限制,现有梳理多侧重介绍某一家档案馆或与作者研究课题相关的档案收藏情况,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部分历史问题的档案介绍也不够细致。近年来,笔者有幸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特别重大项目“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负责其中俄文档案的编目、整理工作。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团队及经费支持,笔者得以接触俄罗斯多家档案馆所藏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档案,因此想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些档案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介绍,以期对学界的相关研究能有所助益。

俄罗斯所藏有关中共党史的档案主要收藏于首都莫斯科地区的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缩写РГАСПИ)、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缩写РГАНИ)、国立俄罗斯联邦档案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缩写ГА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缩写АВПРФ)、俄罗斯国立军事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военный архив,缩写РГВА)、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缩写ЦАМО РФ),以及俄罗斯国立远东历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缩写РГИА ДВ)、哈巴洛夫斯克边疆区国立档案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края,缩写ГАХК)、滨海边疆区国立档案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края,缩写ГАПК)等远东边疆地区的档案馆中。考虑到莫斯科地区的档案馆所藏中共革命时期历史档案的规模及其史料价值,本文将着重介绍前人提及不多或介绍不细的莫斯科地区部分档案馆的档案收藏情况,其具体档案内容则依据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分门别类地予以梳理和介绍。^②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助项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与大革命(1924—1927)”(2025QQJH35)

作者简介:荆宇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侯中军工作室”研究员(北京 100101)。

① 相关梳理有:晓光:《俄罗斯各档案馆所藏中国问题史料》,《百年潮》2002年第8期;谷继坤:《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馆藏中共及国际共运档案资料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孙艳玲:《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有关的俄罗斯档案现状介绍》,《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2期;王翠、曹英发:《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概览》,《陕西档案》2019年第1期;谷继坤:《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馆藏中共及国际共运档案资料评介》,《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7期;陈开科:《俄藏红档(1917—1949)与中国红色历史研究及红色景观的建设》,《晋阳学刊》2023年第5期;等等。

② 由于俄罗斯收藏的有关解放战争直至苏联解体时期中苏关系的历史档案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系统性的介绍和利用,沈志华还以之编著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东方出版中心 2015年版),本文对此不再赘述,只集中介绍此前革命斗争时期的相关档案情况。

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往来资料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早期曾受到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因此留存了相当丰富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主要收藏于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中,俄罗斯方面就曾以该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编纂了著名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资料集,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出版中译本。陈开科曾指出,“有关中共及各类红色组织、中共与苏共及共产国际关系的档案主要收藏于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该馆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与中国红色历史密切相关且内容较为集中的全宗主要有 84、495、504、507、514、517、530、532、533、539、550、627 等”。^①谷继坤则进一步点明,该档案馆所藏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档案“最重要的是第 514 号全宗”,其中第 1 号目录(中国共产党文件)“起讫年代为 1919 年至 1946 年,共保存与中国共产党直接有关的 1165 个卷宗”。^②

不过,该档案馆并未严格按照档案来源或问题类别进行分类归档,导致同一单位或同一问题的档案分散于不同的全宗或目录中,使得每个全宗和目录包含了庞杂多样的档案文献,无形中为学者查阅和利用档案制造了不少麻烦,也增加了对之进行梳理和介绍的难度。大体而言,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与执委会秘书处是这部分档案最主要的来源单位。

1.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史的档案主要收录于全宗 495 目录 154、全宗 514 目录 1 中。其中前人较少提及但比较重要的档案有:(1)有关中国或华人的报刊资料(1920 年—1928 年),^③这部分档案相对分散,涵盖了苏联国内外的多家报刊及苏俄政府、共产国际外事部门的公报,如《旅俄华工大同报》(1920 年 10 月 1 日—1921

年 2 月 1 日)、远东共和国报刊信息汇编(1920 年 10 月 1 日—1921 年 2 月 1 日)、外国报刊电讯稿(1920 年 8 月 30 日—1920 年 11 月 2 日)、华俄通讯社的稿件(1921 年 3 月 14 日—1921 年 6 月 8 日)、苏俄外交部通讯处有关中国和日本情况的通报(1921 年 11 月 17 日—1921 年 11 月 24 日)、名为“过激派之政或共产党之政”的中文小册子、有关东方国家的报刊资料(1922 年 3 月 1 日—1922 年 12 月 31 日)、苏俄外交部通讯处公报(1922 年 1 月 1 日—1922 年 10 月 31 日)、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处搜集的外国媒体报道汇编(1922 年 9 月 29 日—1922 年 12 月 31 日)、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通讯处公报(1922 年 3 月 1 日—1922 年 10 月 31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公报(1922 年 1 月 1 日—1922 年 3 月 31 日)、发给维经斯基的外国报刊材料汇编第 11 和 12 期(1922 年 12 月 15 日—1922 年 12 月 22 日)、《远东之声》杂志(1922 年 1 月 1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处收集的外国报刊信息汇编(4 卷,1927 年 2 月 21 日—1927 年 11 月 24 日)、苏联驻日本全权代表处新闻处公报(1927 年 9 月 1 日—1928 年 6 月 10 日),等等。借助这些史料可以厘清苏联和共产国际是从哪些渠道搜集了哪些与中国有关的信息,有助于理解苏联及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2)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相关材料(1922 年 1 月 21 日—1922 年 2 月 28 日),^④其中包括中俄文速记的会议记录、中国代表团名单、各国代表的委任状和履历表、大会宣言及决议草案,等等。尤为可贵的是在卷 181a 中,收录了中国代表团成员王振翼、宣中华、邓恩铭、夏曦、黄碧魂等人的多张照片,场景包括会场情况、代表团成员在主席台发言以及会后活动等,为丰富学界对此次会议及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认知提供了生动的资料。(3)中共六大会议资料(1928 年),^⑤包括瞿秋白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30 余次例会的会议记录,政治、组织和军事委员会会议速记和备忘录等材料,大会政治决议、工会

① 陈开科:《俄藏红档(1917—1949)与中国红色历史研究及红色景观的建设》。

② 谷继坤:《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馆藏中共及国际共运档案资料评介》。

③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495. Оп. 154. Д. 56-58, 85, 121, 124, 126, 143, 145, 148-150, 154-155, 184, 258-262, 304-308.

④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495. Оп. 154. Д. 157-181.

⑤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514. Оп. 1. Д. 385-426.

运动以及大会有关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党的组织任务、组建苏维埃政府等决议的草案及最终定稿等重要文件。(4)中共地方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往来通信(1930年—1931年),^①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发给长江局的指令(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前线军事委员会发给中共中央的总结报告(1930年10月—1930年11月),中共中央发给各基层党组织的通报(1930年1月—1930年12月),中共中央发给满洲、山东、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福建、云南、广东等地方党委的指令以及各地方党委呈送中央的报告(1930年—1931年),等等。由于革命战争时期缺乏良好的档案文献保存条件,党的许多档案文献未能留存下来,而俄罗斯档案馆收藏的这部分档案恰好可以填补相关研究资料的空缺,推动中共党史党建问题的研究。(5)有关中国文字拉丁化的材料(1931年—1936年),^②其中收录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相关材料,以及《联共(布)远东边区报》《工人之路》等报刊数份,从中可以一窥吴玉章等人旅居苏联期间进行中国文字拉丁化改革的探索历程。(6)有关七七事变前中国共产党抗日问题的资料(1936年3月—1937年6月),^③其中包括有关西安事变的档案文献(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致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书信),中共北方局关于对日作战的指令(包括组织问题的决议、指令以及满洲地方党组织的材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材料(毛泽东访谈录、政府告人民书、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等),中国红军以及东北、西北地区抗日武装的材料,等等。

2. 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的档案则主要收藏于全宗495目录20中。其中涉及中国共产党且比较重要的有:(1)共产国际执委会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决议、通信及其他文件(1925年1月—1940年3月11日),^④包括1928年—1940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汇编,1925年—1926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决议、信件,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

第八次全会中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1937年有关中国共产党政治状况的报告草案,1938年有关中国的形势及对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报告和指示,等等。(2)有关中共抗战问题的档案资料(1937年7月—1940年1月),^⑤其中包括上海抗战代表大会决议草案(1937年11月11日),抗战爆发时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状况的报告草案(1937年7月11日—1937年8月10日),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信函及指令(1940年1月9日—1940年1月10日),1939年9月9日《新华日报》刊登的《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的俄法等多种西文译本(1940年1月17日),等等。

二、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共青团

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其创建、运转及发展自然受党组织的全面重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和管理模式就借鉴了联共(布)对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模式,而中国共青团与青年共产国际(又称少年共产国际)的关系也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如出一辙,因此俄罗斯也保留了大量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共青团往来的档案资料。

国内已有学者指出,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全宗533收录了1919年—1943年青年共产国际的大量档案,主要集中于目录1、目录3卷67、目录10卷1777—1785中,包含了几次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档案,青年共产国际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信件,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执委会和几次代表大会的资料。^⑥

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涉及中国共青团的历史档案分散收录于该档案馆的其他全宗和目录中,这些档案的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而言主

①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514. Оп. 1. Д. 614-634, 687-690.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514. Оп. 1. Д. 666.

③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514. Оп. 1. Д. 859-863.

④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495. Оп. 20. Д. 309-311, 315-316, 318-322.

⑤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495. Оп. 20. Д. 317-318, 324-328, 675.

⑥ 陈开科:《俄藏红档(1917—1949)与中国红色历史研究及红色景观的建设》。

要有:

1. 全宗 514 目录 1,^①其中收录了大量中国共青团与青年共产国际往来的档案资料,包括 1925 年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青团中央的指示,中国共青团第三次会议的决议和呼吁书,1925 年中国共青团中央及其在欧洲、湖南、广东等地的分支组织针对各种问题发出的通告和呼吁书等材料,1928 年 7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材料、会议记录以及会议确定的政治决议、共青团章程、在苏维埃区域内的工作大纲和组织问题决议案,1928 年共青团中央发给地方的指示,1931 年共青团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强领导抗灾的决议、有关苏区共青团工作任务及“青年近卫军”的决议、广东青年团致各地方团组织的信,等等。

2. 全宗 533 目录 1,^②其中收录了中国代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相关材料,包括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时中国代表团的报告、共产国际给俞秀松颁发的参会证件,以及四大的会议记录和张太雷的发言稿,等等。

3. 全宗 533 目录 10 中,除前人提到的卷 1777—1785 外,卷 1809—1831 也是有关中国共青团的档案,^③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1928 年 5 月任弼时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演讲稿,1928 年团中央期刊《中央通讯》,1929 年—1930 年青年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与中国共青团中央的通信,1929 年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材料,1929 年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关于与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决议,1928 年—1929 年陆定一、瞿景白有关中国共青团和工人运动的文章,1930 年中国共青团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全会的会议材料,等等。

现今国内学界对于青年共产国际以及中国共青团的研究总体而言还比较薄弱,俄罗斯档案馆收藏的这些档案正是有关该问题的关键史料,据

此不仅可以厘清中国共青团与青年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双方的互动情况,更重要的是可以深化对中国共青团早期历史的认知,还原其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细节。

三、有关中国大革命的历史档案

历史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给予过诸多支持,俄罗斯也由此收藏了大批与中国大革命相关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现主要藏于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和俄罗斯国立军事档案馆中,涉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势力的分析及与之往来的情况,对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支持,与孙中山、冯玉祥等人的合作,等等。这些档案的具体收藏情况如下:

1.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1)全宗 100 目录 5,^④其中收录了诸多苏俄驻华人员与莫斯科之间的往来通信,内容包括 1922 年—1923 年有关中国军阀混战情况的报告、有关东北和中东铁路等问题的报告、苏俄外交人员与吴佩孚的谈话记录,等等。(2)全宗 100 目录 7,^⑤内容包括 1922 年中苏双方的谈判记录,接待陈独秀及中国共产党大学生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档案文献,1923 年苏联外交部与张作霖、吴佩孚等人的通信(有关中东铁路、购买苏联武器、华俄道胜银行、中国东北的白俄武装等问题),等等。

2. 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全宗 5 目录 1,^⑥内容包括有关 1922 年苏俄在华人员安排的通信,苏俄在华外交人员与吴佩孚、孙中山等人的通信,中俄双方政府就中东铁路进行谈判的资料,苏联驻华外交官对中国形势的分析,越飞、加拉罕等驻华外交官与中国政府、民间组织的往

①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514. Оп. 1. Д. 115-117, 159-162, 462-464, 694.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533. Оп. 1. Д. 35-39, 81-87.

③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533. Оп. 10. Д. 1777-1785, 1809-1831.

④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 0100. Оп. 5. П. 101. Д. 1. , П. 102. Д. 5.

⑤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 0100. Оп. 7. П. 106. Д. 16, П. 107. Д. 17. , П. 107. Д. 19.

⑥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5. Оп. 1. Д. 2144-2194.

来,等等。(2)全宗 159 目录 2,^①主要是 1922 年—1929 年齐切林、加拉罕、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有关中国问题的通信,涉及苏联与北洋政府的建交谈判、同张作霖的交往,中东铁路以及外蒙古问题等。(3)全宗 495 目录 44,^②收录的主要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下属的中国委员会的资料。主要内容包括 1926 年—1931 年中国委员会的会议材料(报告、发言、决议、会议记录等),有关中国局势的声明和报告,多位驻华顾问发回的分析中国大革命形势的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提供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及其他材料,等等。(4)全宗 514 目录 1,^③内容主要包括 1923 年—1925 年苏联驻华全权特别代表处新闻中心每月或每两周发回莫斯科的例行通报,1924 年—1925 年罗斯塔社(РОСТА)驻北京、广州等地记者的通报,军事独立报(НВО)驻广东信息情报处的每日信息汇编,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驻华人员发回的有关国共合作情况的资料、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党务工作的报告、国民党改组情况及其党务工作的报告,广东国民政府、国民党军队的相关情报,苏联及共产国际驻华人员关于中国革命形势、反革命势力、北京市政府及各地政治局势的演变、英日等国对华政策及行动的报告,等等。(5)全宗 534 目录 4,^④其中存有大量赤色工会国际、赤色农民国际等国际组织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档案内容主要包括这些国际组织与中国工农组织、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通信,对中国农村的调查报告,为改造中国农业、开展农民运动制定的计划,等等。(6)全宗 627 目录 1,^⑤整个目录的所有 32 个案卷都是中国大革命时期苏联及共产国际派遣来华的顾问留下的资料。当时来华的顾问按照派遣地大致可分为四组:华南组(Юж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группа)、张家口组(Калганская группа)、开封组(Кайфэнская группа)和驻中共中央的少量顾问。其中,冯玉祥

军中的张家口组和胡景翼(后为岳维峻)军中的开封组只有军事顾问而无政治顾问。^⑥或许是因为军事顾问派遣的数量和范围远大于政治顾问,该部分档案主要与军事活动有关,内容包括华南组对国民革命军编练情况的报告,张家口组对冯玉祥军队的介绍及对其进行编练、整训情况的汇报,有关北伐前广东军事、政治形势的汇报,黄埔军校及其他军校状况的报告,国民革命军军事会议的会议记录,顾问参加的历次战斗的报告,加伦将军与蒋介石有关中国国防计划的通信,有关军事顾问在华期间生活、工作条件的安排和规定,等等。

3. 俄罗斯国立军事档案馆。(1)全宗 4 目录 2,^⑦其中收录了当时苏联驻华外交官搜集的有关中国各派势力的军事情报,包括 1925 年加拉罕等人发回的有关张作霖的东北军、南方孙中山政府的军事情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有关中国问题的通信,涉及中东铁路问题的会议记录(附有中国军阀势力的分布图),等等。(2)全宗 33987 目录 3,^⑧其中收录了大量苏联驻华人员、军事顾问发回莫斯科的报告。内容涉及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北伐战争期间广州的军政情况,1926 年 7 月—1927 年 5 月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有关中国军政情况、国民革命军前线作战情况的报告,1926 年—1927 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海军特别事务局有关中国海军情况的报告,苏联红军化学武器部门对北伐期间英美军队用有毒武器对付广东军队的可能性评估报告,1926 年—1927 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共产国际高层关于北伐战争形势的评估、北伐军内部国民党的情况、对中国革命的内部辩论、调解驻华顾问团内部斗争的指令草案、对北伐期间苏联宣传部门的内部工作评估报告、对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反革命问题的讨论、大革命失败后在华军事和政治工作的重新组织以及对大革命失败的检讨

①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159. Оп. 2. Д. 12-68.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495. Оп. 44. Д. 1-18.

③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514. Оп. 1. Д. 47-100, 118-144.

④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534. Оп. 4. Д. 42-190.

⑤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627. Оп. 1. Д. 1-32.

⑥ 荆宇航:《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华南组军事顾问考辨》,《军事历史研究》2024 年第 3 期。

⑦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военный архив: Ф. 4. Оп. 2. Д. 13, 73.

⑧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военный архив: Ф. 33987. Оп. 3. Д. 90-201.

报告,等等。

长期以来,学界对大革命时期来华苏联顾问(或称共产国际顾问)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顾问,集中探讨政治顾问在国民党的改组、国共合作、工农运动等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对军事顾问的研究则局限于华南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等事迹较为突出的个人,缺乏整体的、系统的梳理和讨论。甚至对军事顾问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黄埔军校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顾问在军校中创立和推广的政治教育模式,而对顾问带来的军队编练体制、战术训练方法、军事装备技术等内容着墨较少。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和军事档案馆所藏的上述档案恰好可以用来补充该领域的研究,深化学界对大革命的认识。

四、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个人案卷

俄罗斯的档案馆中还存有数千位中共党员的档案,主要涉及中共领导人以及早期留苏的中共留学生,其中大部分收藏于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中,少部分收藏于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中,前人对此已有介绍,^①本文再做一点补充。

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 495 目录 225 和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全宗 5 中,收录了几乎所有知名的早期中共党员的档案,其中相当一部分档案极具历史价值。例如,毛泽东的个人案卷中就保存了多份手写的档案,包括毛泽东写给古柏的题为《赣西南富田事变》的信函,作者不详的题为《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以及 1939 年 12 月 28 日毛泽民于柳克斯代毛泽东填写的个人履历表,等等。虽然不知道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手迹为何会保存在莫斯科,但这些材料无论是用以研究毛泽东的个人历史,还是探讨早期中共党史党建问题都意义非凡。这种当事人亲自书写或与当事人关系密切者代写的个人履历表或自述,几乎存在于每个党员的个

人案卷中,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手史料”,对于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而言是无价之宝。

除手写的中文材料外,这些中共党员的个人案卷中还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主要是留苏党员的证件照以及中共领导的工作照、生活照。例如,吴玉章等人入境苏联时使用的护照,萧三在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证(编号 746),方志敏、许光达、陈昌浩、袁庆云、袁牧之、冼星海、马员生、唐铎等人的证件照,以及周恩来、董必武、茅盾、秦邦宪、项英、任弼时等人的工作照、生活照及新闻报道的剪影等。通过这些图像资料可以更为具体、细致地探讨和还原中共党员的日常工作、生活的历史情况,丰富党史党建领域的研究课题。

五、早期中共党员留学苏联的相关档案

早期中国共产党留苏学生中诞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这个群体自然也是学界关注的重要研究对象。除上文提到的中共党员个人档案外,与之相关的苏联学校教学情况、留学生组织及其活动的档案资料也十分丰富,主要收藏在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中,大致情况如下:

1. 全宗 530。已有学者指出,该全宗所含 4 个目录共 266 个卷宗收录了 1925 年—1930 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相关档案,涉及中山大学行政教学、党务工作、出版的印刷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相关讨论和决议等档案文件。^②具体内容包中国学员名单及操守评定,教员名单、履历及操守评定,各年级、各班级的小组调查评定表,中山大学教学委员会主席团备忘录,校方致斯大林、共产国际执委会有关学生录取情况的报告,等等。

2. 全宗 532,其中存有莫斯科东方大学 12414 卷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档案。^③具体内容包中国学生名册,中国学员各学习小组组长的周记和其他报告,校长的工作总结报告及其与各机构或个人的通信,中共留学生的信函和申请书,中国共产党颁发的报考东方大学的批准书,中国学

^① 谷继坤:《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馆藏中共及国际共运档案资料评介》;谷继坤:《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馆藏中共及国际共运档案资料评介》;陈开科:《俄藏红档(1917—1949)与中国红色历史研究及红色景观的建设》。

^② 谷继坤:《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馆藏中共及国际共运档案资料评介》。

^③ 陈开科:《俄藏红档(1917—1949)与中国红色历史研究及红色景观的建设》。

生总会备忘录,等等。

除这两所学校外,该档案馆还系统地收藏了1925年—1938年国际列宁学校(全宗531)、1924年—1930年列宁格勒托尔马切夫军政学院(全宗550)有关中共留学生的档案资料。^①此外,还有零星的中共留学生相关档案散见于其他全宗中,如全宗495目录20和154中的部分案卷,^②其中收录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有关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决议汇编,东方大学部分学生的履历表和操行评定,“江浙同乡会”事件的侦察与审讯资料,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等学校中国学生的申请书和信函,列宁格勒东方学院的教学计划、学生名单、操行评定及录取规则等。而全宗514目录1中的部分案卷,^③则收录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与“托派”和“右派”斗争的资料,“江浙同乡会”事件的调查档案,中国党校毕业生名录,中山大学中国科研院、民族与殖民主义问题科研协会出版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材料等。

六、东北抗联的相关档案

有关东北抗联的档案主要收藏于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和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中,其大致情况如下:

1. 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225、目录238中,收录了多位东北抗联指战员的个人档案,其中不仅包括李兆麟(化名张寿箴)、周保中、冯仲云、王效明、黄玉清等中国籍领导人,还有日后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的金日成、崔庸健(化名崔石泉)、金策、安吉、崔光(化名崔明锡)、金万益等人。档案内容包括当事人手写的《领导人员之履历表》《特别支部党员调查表》等表格,部分领导人的证件照,以及苏联方面汇总的个人信息材料。这些资料对于个人情况的记录极为详细,不仅有姓名、籍贯、民族、

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情况等基本信息,还有参加革命的经过、任职履历、战斗经历、被捕及获释经过、如何来到东北加入抗联、受过何种处分等记载。从中既可以领会当事人参加革命的心路历程,还能梳理出东北抗联的战斗经过。东北抗联进行的多为歼敌数人、数十人的小规模游击战,再加上斗争环境的极度恶劣,致使各场战斗的相关记录极难留存,因此当事人亲笔写下的这些档案对学者而言极为珍贵。

2.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全宗1896目录1,^④其中收录了1942年—1945年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资料。1940年底,东北抗联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被迫陆续退入苏联境内休整。1942年8月1日经过中苏双方协商,在苏联的抗联战士被整编为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即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的档案中,这支部队被记载为“第二方面军88独立步兵旅”,并较为完整地收录了该部队各级领导人员的履历簿,军衔授予及撤销记录,以及88旅政治处收到的政工人员任免文件,等等。

七、余论

通过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档案馆藏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历史档案的梳理,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与其他国家收藏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档案情况不同,莫斯科地区档案馆收藏的档案中有很一部分是由当事人亲笔书写的“第一手史料”,其真实性和权威性整体上要高于其他类型的材料,这也是俄罗斯馆藏档案对中共党史研究意义非凡的重要原因。另外,许多档案都是以中文书写的,甚至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领导人在填写个人资料时使用的也是中文,这无形中降低了中

^① 陈开科:《俄藏红档(1917—1949)与中国红色历史研究及红色景观的建设》。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495. Оп. 20. Д. 863, Оп. 154. Д. 302, 338, 344, 346, 408, 463, 488, 494, 519, 525.

^③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 514. Оп. 1. Д. 112, 114, 121, 274, 495, 509, 591, 595, 598, 1066—1074.

^④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 1896. Оп. 1. Д. 1—4.

国学者利用俄罗斯馆藏档案文献的难度,此种便利远非其他国家收藏的中共历史档案可比。

第二,俄罗斯馆藏中共历史档案的数量巨大且涉及面广,导致其保存情况较为复杂,尽管有些突出的历史问题会建立独立、系统的档案全宗或目录,但涉及同一问题的档案仍可能分散于不同的全宗、目录乃至多家档案馆中。这要求学者在利用俄藏档案时需扩展视野,尽可能广泛地搜集所需的档案信息,从多家档案馆查阅档案,尽量丰富自己所掌握的研究资料。

第三,莫斯科地区俄藏中共历史档案质量高且种类多样,可用来完善和深化许多党史党建问题的研究。这些档案中既有当事人个人的履历表、自述、通信和照片,也有联共(布)、共产国际、学校及其他组织的通报、会议记录、决议、规章制度等公文,还有期刊报纸等媒体资料,许多学界知之甚少乃至尚未触及的问题都可以据此展开探

讨。例如,对于中共留苏党员问题,现在除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外,学界对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国际列宁学校、列宁格勒托尔马切夫军政学院的研究远远不够,仍需努力挖掘俄藏档案史料进行探讨。

第四,由于语言的障碍,中国学界对俄罗斯档案馆藏资源的利用率较低,难以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例如,对大革命时期来华苏联顾问的研究,学界现有的材料多为俄罗斯出版的档案集、顾问回忆录的中译本,研究深度和广度存在很大局限,导致对军事顾问具体的活动以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认识得不够全面。为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应该鼓励学界积极开展对俄罗斯馆藏中国共产党历史档案的译介工作,增进中国学者对其了解,提高这些珍贵史料的利用率。

总之,莫斯科地区,或者说整个俄罗斯的档案馆收藏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是价值非凡的宝藏,值得中国学者进行深度挖掘和利用。

(责任编辑:中和)